

中国史前考古论集

续集

王仁湘 著

中国史前考古论集

续集

王仁湘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史前考古论集：续集 / 王仁湘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 1

ISBN 978 - 7 - 5010 - 4778 - 9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石器时代考古 - 中国 - 文集 IV. ①K871. 10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7093 号

中国史前考古论集续集

著 者：王仁湘

责任编辑：王 伟 周燕林

封面设计：张征雁

责任印制：梁秋卉

出版发行：文物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邮 编：100007

网 址：<http://www.wenwu.com>

邮 箱：web@wenwu.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31.5

版 次：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010 - 4778 - 9

定 价：190.00 元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非经授权，不得复制翻印

永远的仰韶

(代序)

[仰韶之门]

在一个细雨纷飞的时刻

我怀着一种虔诚

轻轻地

推开这扇柴门

蓦然间

我看见面前有一条路

蜿蜒坎坷

连接着古今

向往着未来

这是古老的仰韶之路

那是 80 年前，在一些偶然发现的古老石器的吸引下，一个外国学者经历长途的崎岖，来到了当时并不知名的黄河中游的小村庄——仰韶村。他来自遥远的瑞典，他就是安特生。是安特生发现了仰韶村的秘密，是他将这些秘密公诸于世，让全世界知道了仰韶村，知道中国也有新石器文化，这就是他命名的仰韶文化。80 多年来，仰韶文化的研究不仅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中心课题，也是一些考古学家治学立业的基础。仰韶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是 20 世纪中国史前考古灿烂的篇章。

80 年后，我随着一个朝圣的车队，在一阵细雨的滋润中，来到向往已久的仰韶村。村子在澠池城北 8 公里处，是一个靠近黄河南岸、三面环水的小村庄。因为面对着一座名为韶山的小山，这村庄也就有了“仰韶”这个响亮的名字。仰韶遗址位于仰韶村南和寺沟村北的台地上，面积 30 多万平方米。这里有厚厚的黄土层，沟壑崖头处处可见房址和灰坑遗迹。虽然见惯了东西南北的许多遗址，但面对着这一方考古圣土，激动之情还是久久不能自己。这终究不是一座普通的考古

遗址，它的根须，早已深种在中国考古人的心中。

漫步在仰韶遗址，虽然已经找不到当年安特生树立“仰韶文化区”木牌的地方了，也听不到他那手摇留声机的洋腔洋调了，但我却能感觉到那位安牧师（安蛮子）的身影深深地印在了这块土地上。我离开朝圣的人流，独自信步走向村外，我感受着安特生当年感受过的气息。当我怀着一种虔诚，双手轻轻推开一扇柴门，蓦然间我看到了一条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路，这是仰韶之路。也许安特生曾走过我眼前的这条路，他也许就是在这条路上，反复思考了这样的问题：仰韶这样灿烂的彩陶文化，它是怎么出现的呢？它的源头在哪里？

在追寻仰韶文化源头的过程中，包括发现者安特生在内的不少研究者都曾宣称自己找到了真正的源头，但是他们并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不断有后来者发现新证，否定旧说。探索中不断变更的仰韶文化源头，成了学界一道非常特别的景致。

在仰韶文化刚刚确立不久，安特生根据河南与甘肃发现的彩陶同中亚土库曼斯坦的安诺文化彩陶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两者有密切的联系，最先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为演绎中国文化西来说作了很大努力。于是安特生把搜索的目光转向中国西北部，他推测那里应存在着一条彩陶传播的通道。安特生沿着古老的黄河西行，去追溯仰韶文化的源头。他本来打算只在西北地区考察几个月就返回北京，但在甘肃和青海一带发现了丰富的古文化遗存，这使得他流连忘返，一直在那里待了近两个年头。

20世纪70年代以后，也就是在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半个世纪后，中国考古学家在仰韶文化生长的土地上，找到一系列的前仰韶文化遗存，我们从中可以寻得仰韶文化本土起源的许多证据，这才完全否定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理论，不过安特生已经无法了解这些发现了。

其实我们也明白，找到了前仰韶，并不等于解决了仰韶的起源问题。当裴李岗、磁山文化确立，我们便指认仰韶起源于此。当老官台、白家、天地湾、北首岭下层被认识，我们又认定仰韶起源于彼。一时间辩之不明，我们又说仰韶起源于此也起源于彼。近年又在关中、晋南发现了晚于老官台和裴李岗文化的零口、枣园遗存，原来的认识又全都成了过时的东西，这些发现使很多人相信，我们这才找到了仰韶真正的源头。

不可否认，关中和晋南地区零口一类前仰韶文化遗存的发现，让人们看到了仰韶文化探源研究的新希望。但是在这个希望面前，直觉告诉我们，仰韶的源头可能还有疑惑。且不说研究者对零口一类遗存的归属尚有分歧，冷静一点看，这

类遗存其实不论与半坡还是与庙底沟之间，距离都是很明显。我以为，将它作为半坡或是作为庙底沟文化的源头，都还显得有些为时过早。

直觉让我们认识到，零口文化的出现非常突然，它切断了建立在学者们论著中的仰韶与前仰韶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我们以前用心探求的前仰韶的传统并没有为仰韶文化所继承。这个事实对我们的打击显得太残酷了一些，它致使我们过去精心构筑的仰韶文化源流体系几近瓦解，也似乎让我们过去这方面的所有研究顿时没了什么实际价值。

寻找源头，是个很费力的工作。不要以为一条大河，源头一定会十分彰明。长江和黄河的源头就不是一下子确定下来的，历史上经历了多次认错源头的事情。对于仰韶文化的研究也是如此，我们似乎已经到了接近破解谜底的最后关头，但是20世纪已经结束，学者们在旧世纪来不及完全解决这个世纪难题。我们寄希望于新世纪之初，曙光应当就在前头。

不仅是源头的寻找还有待努力，我们现在对仰韶的命名、分布范围、社会发展状况等问题的研究，也存有许许多多的争论。但是对于很多学者来说，我们现在还不愿意舍弃“仰韶”，这可以称作几代学者的“仰韶情结”。在安特生的时代，仰韶文化的命名不仅是恰当的、及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仰韶文化命名伊始，就成了新生的中国田野考古学的一面大旗，许多的学者都由这旗下走过，成就了他们的伟业。

我想，没有仰韶村的发现，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开始的时日可能还会晚一些。没有仰韶村的发现，在大中原最先发现的史前文化就不会是以“仰韶”命名的文化，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建构或许是通过另外的途径完成的，“仰韶”这个名称也不会出现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这样说：史前时代的中国，是从仰韶村遗址的发现而开始发现的，仰韶村应当被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祥地载入中国考古学史。在中国考古学界，尤其是在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领域，我们不能没有仰韶村，也不能没有仰韶文化。

我在仰韶村的朝圣，时间虽短暂，印象却非常深刻。当仰韶村慢慢消失在背后，我心中还在默念着它。我相信进入21世纪以后，仰韶与仰韶文化，同龙山和龙山时代这样的词汇一样，还将继续是中国考古学中辉煌的名字，还将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永恒论题。

王仁湘

作于2001年

目 录

仰韶文化诸遗存	001
四川和重庆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发现与研究	070
西藏高原的晚期新石器文化发现与研究	084
石兴邦：叩访古代中国的一位勤谨谦和的学者	100
一柄手铲解读史前中国 ——读《石兴邦考古论文集》	111
四正与四维：考古见到的中国早期两大方位系统 ——由古蜀时代的方位系统说起	118
狩猎、农耕、火食与进化 ——史前饮食考古四题	141
史上盘中餐 ——关于滋味的考古发现	157
由汉式饼食技术传统的建立看小麦的传播	167
面条的年龄 ——兼说中国史前时代的面食	180
苏秉琦先生与彩陶研究	186
彩陶：庙底沟文化时期的艺术浪潮	196
彩陶：史前人的心灵之约	208
庙底沟文化鱼纹彩陶论	219
彩陶“西阴纹”细说	254
大地湾遗址彩陶研究	271
甘肃史前彩陶：起源、传承与象征	324
雕龙碑彩陶艺术小识	347
庙底沟文化彩陶向南方两湖地区的传播	360
大溪文化彩陶溯源	373
红山文化彩陶简论	392

简论红山文化彩陶三元素之来龙去脉	402
西南地区史前陶器衬花工艺探讨	
——由西藏曲贡和卡若文化的发现说起	412
琮璧名实臆测	426
史前玉器中的“双子琮”	
——兼说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兽面冠饰	435
器小成大用	
——崧泽文化随想	451
唤醒沉睡的废墟	
——大遗址记忆的中国大历史扫描	456
洒扫沉埃	
——斜说考古学	472
后 记	493

仰韶文化诸遗存

一 发现与研究简史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的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代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仰韶文化又是中国田野考古最早发现和确认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仰韶文化的发现和确认，与瑞典学者安特生（Andersson Johan Gunnar）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918年在北洋政府农商部担任矿政顾问的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采集古生物化石。1920年他的助手刘长山在仰韶村收集到数百件石器，安特生据此认定在仰韶村一带肯定存在一处史前时代遗址。于是他在1921年4月又一次到仰韶村考察，这是中国一次十分重要的考古调查。他在村边冲沟的崖壁上发现了远古时代的文化堆积，采集到一些石器和陶片，包括绘有红色或黑色图案的彩陶片。安特生在征得中国政府的同意后，于1921年年末在仰韶村遗址进行了正式发掘。参与这次发掘的还有中国地质调查所的5位工作人员，他们共发掘了17个地点，获得了大批珍贵文化遗物^[1]。安特生在仰韶村的发掘，是中国第一次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正式发掘，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建立和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发展，具有开创之功。

1921~1922年，安特生又在渑池调查发掘了其他一些遗址。他认为这些地点的发现都属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同类遗存，因此提出了“仰韶文化”的命名。因为这类遗存均以彩陶为明显特征，所以安特生又称之为“彩陶文化”。从此，仰韶文化的研究不仅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发端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成为中国史前考古学乃至整个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而且一直影响到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

1951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对仰韶村进行了第二次发掘^[2]，后来在1980~1981年又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3]，进一步弄清了遗址堆积的内涵，得知那里不仅有仰韶文化遗存，还包括有安特生当时所不知晓的龙山文化遗存。

经过数十年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仰韶文化及受仰韶文化明显影响的遗址发现

[1] 安特生：《中国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1923年5号。

[2] 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河南调查团：《河南渑池的史前遗址》，《科学通报》1951年2卷9期。

[3]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渑池仰韶遗址1980-1981年发掘报告》，《史前研究》1983年1期。

已有数千处，它的分布以陕西、河南、山西为中心，影响远达甘肃、湖北、河北和内蒙古南部边缘地区。

作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仰韶文化的研究经历了 80 多年的发展过程。在 20 世纪 20 年代，是开始发现与初步研究阶段，以仰韶村的发现为标志，确认中国有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命名了仰韶文化。到 30 ~ 40 年代，是深入认知的研究阶段，以 1931 年后冈三叠层的发现最为重要，由认知龙山文化而进一步了解仰韶文化，并且确认龙山文化晚于仰韶文化。以 1945 年夏鼐重新改定齐家与仰韶两期相对年代为标志，中国学者基本否定了安特生判定的中国黄河流域史前文化年代表。

进入 50 ~ 60 年代，大规模考古发掘和全面研究使仰韶文化的面貌更为清晰，西安半坡和陕县庙底沟等一系列遗址的发掘取得重要收获。半坡和庙底沟两个遗址的发掘，确立了仰韶文化的半坡和庙底沟两个主要类型。调查和发掘遗址数量大大增加，仰韶文化的地区与时代特征渐渐分明，类型和分期研究成为研究者们的重要课题。苏秉琦发表《论仰韶文化的几个问题》，对仰韶文化进行了全面研究，是这一时期仰韶文化研究成果的阶段总结〔4〕。

到了 70 ~ 90 年代，专题研究蓬勃开展，探源研究成果显著。这一时期发掘的重要遗址有临潼姜寨和郑州大河村等，为探索仰韶文化渊源而发掘的重要遗址主要有秦安大地湾、临潼白家村、渭南北刘、武安磁山和新郑裴李岗等。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仰韶时代”的概念，将公元前 5000 ~ 前 3000 年的新石器文化作为一个大的时段进行了系统研究〔5〕。郑州西山仰韶城址和关中、晋南一些典型遗址的发掘，为渐趋冷落的仰韶文化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期间获得了大批碳十四年代数据，绝对年代的研究成为现实。专题研究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主要有聚落形态、农业起源、生产工具、制陶工艺、彩陶、埋葬制度、社会发展阶段、文化源流等，通过多角度的全面深入研究，对仰韶文化的了解更加全面透彻。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以仰韶文化发现时间最早，发现遗址最多，研究最为深入，影响也最广泛。

当然，不同的研究者对仰韶文化的理解会有明显的差异，关于它的分布范围、年代判断、类型划分、文化性质乃至社会结构，都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在“大仰韶”的概念形成以后，一些研究者对传统的“仰韶文化”的命名有了重新考虑。有的提出了“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和“大河村文化”的命名，用以取代仰韶文化〔6〕。

研究者对仰韶文化的概念并没有一致的认识，有的将它作为一个时代的代称，这

〔4〕 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 年 1 期。

〔5〕 张居中：《仰韶时代文化刍议》，《论仰韶文化——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 60 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原文物》1986 年特刊；张忠培：《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文物季刊》1997 年 1 期。

〔6〕 丁清贤：《关于“仰韶文化”的问题》，《史前研究》1985 年 3 期。

是广义的仰韶；有的只将它作为典型仰韶文化的名称，这是仰韶文化的本体，也是狭义的仰韶；还有的将包括典型仰韶和与之关系密切的文化统称为仰韶文化。本文阐述的仰韶文化，主要指的是研究者们认定的中心分布区域的典型仰韶文化，包括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西王村文化，这是仰韶文化一脉相承的三个发展阶段。对于中心分布区域之外其他在发展过程中受仰韶文化影响较大而被划入仰韶文化系统的文化遗存，也兼为述及。

二 分布范围和典型遗址

由于对仰韶文化的界定存在着分歧，所以研究者们对于它的分布范围也有着明显不同的看法。调查发现的数以千计的仰韶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陕西、河南、山西三个省区内，此外在甘肃、湖北、河北和内蒙古临近中原的边缘地区也有分布。有些研究者划定的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还要广大一些，认为以陕西、河南和晋南为中心，西达河西走廊，东至鲁西地区，北至河套一带，南抵汉水流域。各地遗址的分布，由于地域的不同，又划分为几个不同的文化区域，包括关中—陕南—豫西—晋南区、洛阳—郑州市、豫北—冀南区、丹江区、陇东区、张家口区、河套区等〔7〕。

仰韶文化中心分布区在关中—陕南—豫西—晋南，在这个范围之外的表现有相似特点的文化遗存，是仰韶文化影响的结果，重要的是这些外围遗存的来源与中心区域的仰韶文化并不完全相同。为了与过去的研究相衔接，我们在这里以中心区的叙述为主，也仍然要涉及这些外围遗存。对于这些外围遗存有的研究者已经提出了一些命名，如“后冈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秦王寨文化”或“大河村文化”、“下王岗文化”等（图1）。

仰韶文化及相关的外围遗存的典型遗址，有陕西的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福临堡，扶风案板村，邠县下孟村，临潼姜寨，华县元君庙、泉护村，华阴横阵村，渭南史家村，铜川吕家崖〔8〕、李家沟〔9〕、瓦窑沟，西乡何家湾，南郑龙岗寺，商县紫荆；山西的夏县西阴村遗址，芮城东庄村、西王村，翼城北橄；河南的陕县庙底沟、三里桥，滎池仰韶村，洛阳王湾、秦王寨，郑州大河村，荥阳点军台，浙川下王岗，安阳后冈、大司空、大正集，濮阳西水坡；河北的磁县下潘汪；甘肃的秦安大地湾、王家阴洼；湖北的郟县大寺等。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8〕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铜川吕家崖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3年6期。

〔9〕 西安半坡博物馆：《铜川李家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与文物》1984年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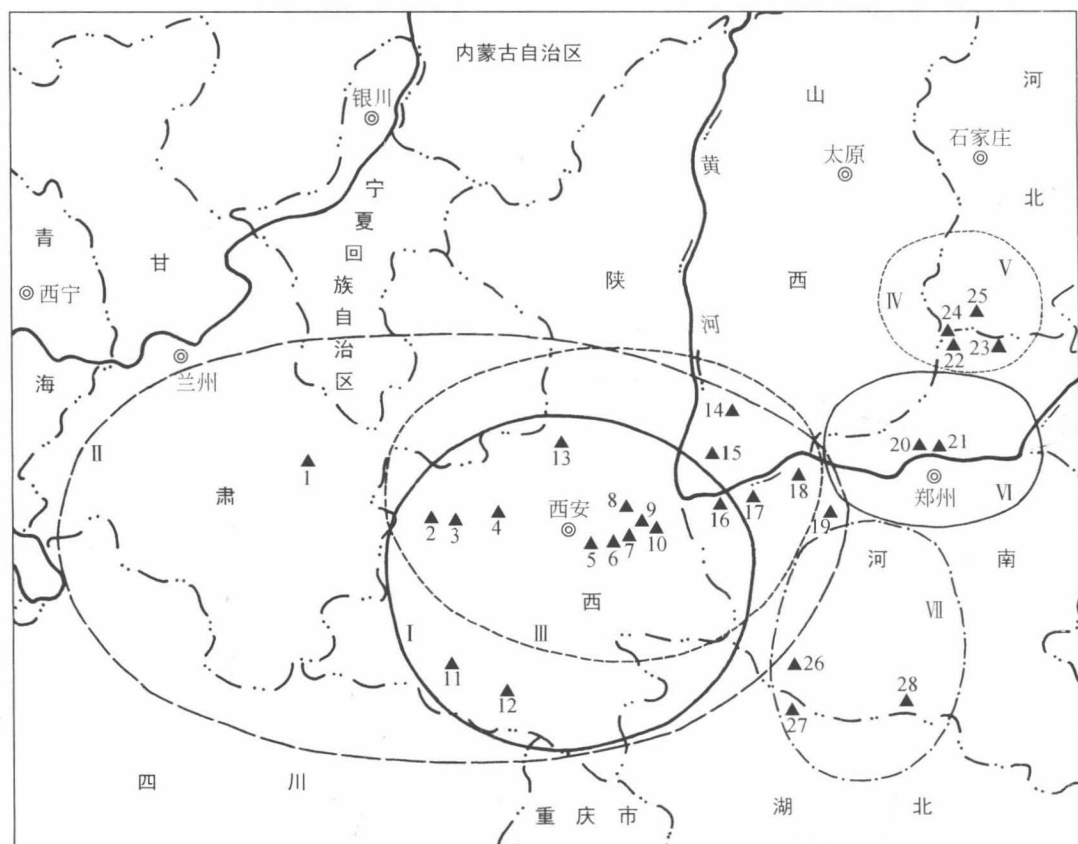


图1 仰韶文化群及主要遗址分布示意图

I. 半坡文化 II. 庙底沟文化 III. 西王村文化 IV. 后冈一期文化 V. 大司空文化 VI. 大河村文化 VII. 下王岗文化
 1. 秦安大地湾 2. 宝鸡北首岭 3. 宝鸡福临堡 4. 扶风案板村 5. 西安半坡 6. 临潼姜寨 7. 渭南史家 8. 华县泉护村 9. 华县元君庙 10. 华阴横阵村 11. 南郑龙岗寺 12. 西乡何家湾 13. 铜川瓦窑沟 14. 夏县西阴村 15. 芮城东庄村和西王村 16. 陕县庙底沟 17. 渑池仰韶村 18. 洛阳王湾 19. 汝州阎村 20. 荥阳秦王寨 21. 郑州大河村 22. 安阳后冈 23. 濮阳西水坡 24. 安阳大司空 25. 磁县下潘汪 26. 浙川下王岗 27. 郟县大寺 28. 邓州八里岗

大地湾遗址：面积12万平方米，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于1978~1984年进行多次发掘，发掘面积1.37万平方米。遗址下层为前仰韶文化堆积，其次为仰韶文化和早期龙山文化堆积，仰韶层包括了半坡、庙底沟和西王村三个时期的遗存，发现有墓葬和大型建筑遗迹^[10]。

北首岭遗址：面积约6万平方米，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在1958~1960年和1977~1987年进行了7次发掘，发掘面积约5000平方米。发现房屋居址50

[10]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第九区发掘简报》、《秦安大地湾405号新石器时代房屋遗址》、《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1978至1982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3年11期；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2期；郎树德：《大地湾考古对仰韶文化研究的贡献》，《论仰韶文化》，《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

座，墓葬 451 座，还有陶窑和排水沟等遗迹，出土大量陶器、石器和装饰品。遗址的堆积中期为半坡文化，晚期为西王村文化，早期为前仰韶的“北首岭类型”。早中期都有墓地，晚期为村落遗址^[11]。

福临堡遗址：面积 18 万平方米，1984 ~ 1985 年由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宝鸡工作站联合发掘，发掘面积 1344 平方米，揭露的遗迹有房址、陶窑、灰坑和墓葬。遗址分属庙底沟和西王村文化，还发现了一个介乎二者之间的过渡层，45 座墓葬属半坡文化^[12]。

瓦窑沟遗址：面积 5 万平方米，1991 年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发掘面积 8000 平方米。遗址主要为半坡文化堆积，清理 23 座房址、70 座成人墓葬和 46 座瓮棺葬，发现有小围沟圈起来的儿童瓮棺葬墓地。这里也是一处有环壕的聚落遗址^[13]。

案板村遗址：面积 70 万平方米，1984 ~ 1987 年由西北大学历史系发掘，发掘面积 1625 平方米。上层为龙山文化堆积，仰韶文化堆积分属庙底沟和西王村时期，发现有作为祭仪使用的大型房址，出土的陶塑人像很有特色^[14]。

半坡遗址：面积约 5 万平方米，1954 ~ 1957 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进行了 5 次发掘，发掘面积 1 万平方米，1971 年西安半坡博物馆又进行过小规模发掘。这是一个具有完整布局的村落遗址，揭露房址 46 座、墓葬 247 座、陶窑 6 座，出土了包括陶器、石器和骨器在内的大量文化遗物，还有丰富的农作物和包括家畜在内的动物遗存^[15]。

姜寨遗址：面积约 5 万平方米，西安半坡博物馆等在 1972 ~ 1979 年进行了 11 次发掘，发掘面积 1.7 万余平方米。文化堆积包含仰韶文化的半坡、庙底沟、西王村几个主要阶段的遗存，发掘揭露出一座包括居住区、窑场和墓地的半坡时期大型聚落址，出土大量文化遗物^[16]。

元君庙墓地：面积 600 平方米，1958 ~ 1959 年由黄河水库华县考古队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发掘，整个墓地已全面揭露。清理半坡时期墓葬 57 座，多数为多人二次合葬，墓穴排列整齐有序，合葬有一定的规则。随葬品有生产工具、陶器、装饰品和食物，以日用陶器为主^[17]。

泉护村遗址：面积 60 万平方米，1958 ~ 1959 年由黄河水库华阴考古队发掘，发掘面积 6000 余平方米。遗址的仰韶层堆积属庙底沟时期，发现有半地穴方形房屋基址和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 年。

[12]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等：《宝鸡福临堡》，文物出版社，1993 年。

[13] 王伟林：《瓦窑沟史前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1995 年 5 月 21 日。

[14]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专业：《扶风案板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 年。

[1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西安半坡》，科学出版社，1963 年。

[16] 西安半坡博物馆等：《姜寨》，文物出版社，1988 年。

[17]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1983 年。

成组的陶窑群，出土的花卉与鸟纹图案彩陶为庙底沟时期彩陶图案的典型代表^[18]。

横阵村墓地：面积 12 万平方米，1958 ~ 1959 年由黄河水库华阴考古队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发掘，发掘面积 1000 平方米，揭露了一处较为完整的半坡时期墓地，清理墓葬 24 座，还有灰坑葬和瓮棺葬。墓葬以多人二次合葬为主，其中 3 座大坑套小坑的大合葬墓最引人注目，合葬者多达 40 多人，许多研究者都认为这是复原仰韶时期家族制度的重要资料^[19]。

史家村墓地：面积约 2 万平方米，1976 年由西安半坡博物馆进行发掘，发掘面积 250 平方米，揭露出一处半坡时期墓地。清理墓葬 43 座，其中 40 座为多人二次合葬，每墓合葬者一般为 20 人左右，最多的达 51 人。多数墓中都发现了以陶器为主的随葬品，也见到少量的生产工具。史家墓地的文化性质体现有半坡和庙底沟时期的双重点，有的研究者或将它归入“半坡类型”，或单独命名为“史家类型”^[20]。

何家湾遗址：面积约 1 万平方米，1980 ~ 1982 年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 1475 平方米。遗址文化堆积下层为李家村文化，上层为半坡文化。发现半坡时期居址 35 座，墓葬 156 座，另有瓮棺葬 21 座。这是分布在汉水流域的典型半坡文化遗存，出土不少精致的文化遗物^[21]。

龙岗寺遗址：面积约 7500 平方米，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于 1983 ~ 1984 年进行发掘，发掘面积 1800 余平方米。遗址文化堆积与何家湾相似，下层为李家村文化，上层为半坡文化。发现半坡时期墓葬 423 座，其中土坑墓 409 座，瓮棺葬 14 座。土坑墓以单人葬为主，有 11 座二人以上的多人二次合葬，也发现大坑套小坑的合葬形式^[22]。

西阴村遗址：面积 30 万平方米，1926 年由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李济主持进行首次发掘，发掘面积约 40 平方米；1994 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掘面积 576 平方米。主要堆积属庙底沟文化，还有少量西王村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堆积。发现庙底沟时期房址和壕沟，未见完整聚落址，出土大量彩陶等文化遗物^[23]。

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址：两处相距 20 多公里，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 1958 ~ 1960 年发掘。东庄村遗址面积 12 万平方米，发掘面积 1180 平方米。遗址的仰韶层属半坡时期，发现有多人二次合葬墓和数座陶窑遗迹。西王村遗址面积 10 万平方米，发

[18] 黄河水库考古队华县队：《陕西华县柳子镇考古发掘简报》，《考古》1959 年 2 期；《陕西华县柳子镇第二次发掘主要收获》，《考古》1959 年 11 期。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工作队：《陕西华阴横阵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 4 辑）》，1984 年。

[20] 西安半坡博物馆等：《陕西渭南史家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 年 1 期。

[2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南考古报告集》，三秦出版社，1994 年。

[2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龙岗寺》，文物出版社，1990 年。

[23] 李济、袁复礼：《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书林书局，1927 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西阴村史前遗存第二次发掘》，《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年。

掘面积近 400 平方米。仰韶文化堆积的下层属庙底沟时期，上层面貌有明显不同，具有与半坡和庙底沟时期相区别的陶器群，如浅腹盆、小平底碗、深腹瓮、镂孔柄豆和长颈尖底瓶等，所以在后来提出了“西王村类型”的命名^[24]。

庙底沟遗址：面积约 24 万平方米，1956 ~ 1957 年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发掘，发掘面积近 4500 平方米，下层堆积为庙底沟文化，发现遗迹不多，但出土陶器等文化遗物十分丰富，彩陶曲腹钵与曲腹盆、双唇尖底瓶、鼓腹罐、釜、灶为代表的陶器群具有明显的特色，使它成为仰韶文化繁荣时期的代表性遗址^[25]。

王湾遗址：面积 8000 平方米，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 1959 ~ 1960 年进行了两次发掘，发掘面积 3350 平方米。下层为仰韶文化堆积，发现房址 7 座、成人墓葬 25 座、瓮棺葬 43 座。遗址的第二期文化堆积介于仰韶和龙山之间，研究者一般还是将它归入仰韶晚期，曾将它命名为“王湾类型”^[26]。

大河村遗址：面积 30 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达 7 米。1972 ~ 1987 年进行了 21 次发掘，发掘面积约 5000 平方米。遗址前四期堆积原被划属仰韶文化，一、二期相当于王湾一期文化，三、四期则与庙底沟文化比较接近，以三、四期的遗迹遗物最为丰富。三、四期发现单间和连间的房址 20 多座、瓮棺葬 70 多座，出土大量文化遗物。遗址还发现有更早的文化堆积^[27]。不少研究者认为大河村遗址的前龙山遗存与仰韶文化关系密切而又另具特点，所以同类遗存可以命名为大河村文化。

后冈遗址：面积 10 万平方米，于 1931 年进行了首次发掘，后来又发掘过多次，主要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担，发掘面积在 600 平方米以上。遗址因最初发现“仰韶 - 龙山 - 商文化三叠层”而著名，第一期文化遗迹现象只见到一些保存不好的房址和墓葬，出土文化遗物比较丰富。它因与半坡文化表现出有相似因素而被称为仰韶文化的“后冈类型”，后来对它的认识又有了变化，认为是与仰韶不同谱系的另一个文化，所以命名为“后冈一期文化”^[28]。

西水坡遗址：面积 5 万平方米，于 1987 ~ 1988 年进行发掘，发掘面积 5000 余平方米，主要堆积被划属仰韶文化的“后冈类型”。1988 年发掘墓葬 148 座，瓮棺葬 38 座，另有少量陶窑和房址。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了多组蚌塑龙虎等动物图形，揭示了

[2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芮城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73 年 1 期。

[2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 年。

[26] 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洛阳王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27]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 年。

[2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 - 1959 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 年 2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1 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 年 3 期；《1972 年春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 年 5 期；《安阳后冈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82 年 6 期，张忠培等：《后冈一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2 年 3 期。

史前宗教与艺术的深刻主题^[29]。

下王岗遗址：面积 6000 平方米，由河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于 1971 ~ 1974 年进行发掘，发掘面积 2300 余平方米。遗址下层发现居住址 43 座、墓葬 575 座、瓮棺葬 22 座，揭露的晚期大型长屋居址最为重要^[30]。下层堆积原被划属仰韶文化，已有命名为下王岗文化的动议。

三 文化特征

以半坡、庙底沟和西王村文化为主干的仰韶文化，被有些研究者称为“典型仰韶文化”，其文化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定居的农耕村落基础上出现了大型环壕聚落，聚落中的居址构成几级社会结构。居址以圆形和方形半地穴式建筑为主，建筑方式主要为木骨草拌泥墙、红烧土地面。居址附近有大规模公共墓地，成人以单人一次葬为主，一度流行二次合葬，幼儿多采用瓮棺葬。随葬品以实用陶器为主，也有一定数量的生产工具和装饰品。日常生活用具主要为陶器，早期以红陶为主，器表装饰多见粗细绳纹，也有弦纹等，有一定数量的彩陶，器形有罐、瓮、尖底瓶、碗、钵、盆，多为平底器；中期灰陶比例增大，新增器形有釜、灶、鼎和豆，彩陶纹饰有所变化。生产工具有石器、骨器、陶器，以石器和骨器为主。早期有一定数量的打制石器，磨制石器主要有斧、镑、凿、铲和长方形小石刀。骨器大多磨制较精，多见镞、锥和针等。装饰品有骨珠、骨笄、陶笄和陶环等。

仰韶文化的聚落多在靠近水源的地方，有面积达数万至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村落，建有环绕的壕沟，村落附近有制陶的窑场和公共墓地。居址排列有序，在早期以圆形与方形半地穴式单间建筑为主，逐渐发展为平地起建的方形单间和套间建筑，建筑面积也有明显扩大。室内建有火灶，火灶由瓢形和圆形穴状灶坑向平地起围的火塘演变。房屋的建筑方式基本为木骨草拌泥墙、烧土地面，晚期居住面使用了混合土抹浆技术。

埋葬有规范的制度，公共墓地设在村落附近，死者按一定的规则埋葬在各自的墓区。成人流行使用土坑葬，以单人一次葬为主，死者多数头向西或西北。早期偏晚阶段一度流行二次合葬，合葬者数人、数十人不等。随葬品早期略为丰富，以实用陶器为主。幼儿多采用瓮棺葬，葬具用瓮与钵、盆套合而成，晚期也有用鼎、豆和尖底瓶作葬具的。

陶器为手制，主要采用泥条盘筑的制法。早期以红陶和红褐陶为主，灰陶与黑陶

[29] 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 年 3 期；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1988 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 年 12 期。

[3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浙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 年。

呈增加的趋势。主要器形中的罐、瓮、尖底瓶、碗、钵、盆，分别作为炊器、盛器、水器和食器使用，后来出现的一定数量的釜、灶和豆，主要用作炊器和食器。陶器纹饰早期以粗绳纹、细绳纹、弦纹和锥刺纹为主，逐渐出现线纹、篮纹和附加堆纹，弦纹减少，锥刺纹消失。早晚都有一定数量的彩陶，由红、黑色的单色彩发展为带白衣或红衣的多色复彩，再变化为单色彩。彩陶纹饰由以象生类图案和直边几何图形多见，发展为以弧边几何图案为主，构图表现出由简而繁继而趋简的特点。彩陶的代表性图案早期是鱼纹、人面鱼纹、直边几何纹，中期开始是鸟纹、花瓣纹和弧边几何纹。

生产工具中石器和骨器发挥着主要作用，也有一些陶质器具。早期打制石器占较大比重，石器主要类别有斧、镑、铲、刀、盘状器、纺轮等，中期打制石器比例下降，出现窄条穿孔铲，长方形穿孔小石刀在数量上有明显增加的趋势，还见到大量陶刀。骨器主要类型为镞、锥、针等，多为狩猎和手工制作使用的尖刺类器具。

虽然作了一些地域上的限定，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仍然不小，在文化内涵的某些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特征。半坡、庙底沟、西王村作为前后相接续的三个文化，基本上代表了仰韶文化早、中、晚三个发展阶段，这三个文化也具有自己的个体特征。对于这些区域性的和个体性的特征，下面还要述及。

四 文化群内的文化划分

仰韶文化延续时间很长，分布地域又很广泛，各地的遗存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差异。仰韶文化类型的研究，开始于半坡和庙底沟两类型相对年代与性质的讨论。半坡和庙底沟遗址的发掘，确立了仰韶文化的两个主要类型，也奠定了仰韶文化研究的基础。对这两个类型的关系，起初有认为半坡早于庙底沟的^[31]，也有认为后者早于前者的^[32]，还有认为两者是同时的^[33]。一直到现在，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还依然存在，多数意见认为两类型具有一脉相承发展关系，也有人说并不能完全肯定谁早谁晚^[34]，现在这两个类型之间关系的讨论还在继续^[35]。

[31] 石兴邦：《黄河流域原始社会考古研究上的若干问题》，《考古》1959年10期；严文明：《论庙底沟仰韶文化的分期》，《考古学报》1965年2期。

[3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杨建芳：《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分期》，《考古学报》1962年1期。

[33] 石兴邦：《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考古》1962年6期；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1期。

[34] 严文明：《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考古与文物》1980年1期；巩启明：《试论仰韶文化》，《史前研究》1983年1期；安志敏：《略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问题》，《考古》1972年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35] 戴向明：《试论庙底沟文化的起源》，《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知识出版社，1998年。